

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前提、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

王芳, 梁浩

(上海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203)

摘要: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实现民族精神独立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标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前提是祛除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强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三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 中华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在民族危机中“失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重塑”, 到新时代实现“高扬”的演进历程。在新征程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应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夯实物质基础, 把坚持“两个结合”作为根本途径, 深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以此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旺盛的生命力与广泛的辐射力。

关键词: 中华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3-0273-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0508242

On the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Consolidating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WANG Fang, LIANG H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al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ing the cultural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chieving national spiritual independence, and also marks its distinction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excludes the influence of three ideological trends: cultural revivalism, cultural hegemonism, and cultural nihilism. In modern times,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experiencing decline during the national crisis, reshap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nhancing in the New Era.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vigorously improv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strengthen its material foundation, adhering to the “Two Integrations”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fundamental path, and enrich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收稿日期: 2025-05-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2024JZDZ07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专项(24VVSZ165);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2024VVSZ014)

第一作者: 王芳, 女, 教授。研究方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E-mail: shwfl63163@163.com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 to ensure its vibrant vitality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Keywords: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wo Integr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也是理解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与未来走向的关键要素。“文化主体性”指的是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坚持和自我创造,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自觉,即意识到“我者”与“他者”在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文化自主,即拥有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的文化内核,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依附、受制或屈服于“他者”的思想观点;三是文化自为,即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实现自我文化的创新发展。“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如此——文化上的自我、自主、自为,赋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身份标识、强大的生命活力,也确保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重要的时代命题。深刻把握其理论前提,系统梳理其从近代“失落”到“重塑”的历史进程,探寻有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显得十分迫切且必要。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理论前提

当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历史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则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核心理念的建构密不可分。

从史前时期到秦汉时期,多部落(族群)交融共生逐步形成华夏民族,这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部落氏族社会,不同部落“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族群差异催生了文化主体意识的萌芽。殷商时期,确立了完整的文字书写系统,建构了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中原”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正统地位^[29]。西周完备的礼制文化和分封制度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下深刻

烙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中华文化形成第一个发展高峰,也为其精神内核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世界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以独特的精神气质区别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终在秦汉统一王朝时期正式确立,其文化特征表现为交融性突出、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以儒、道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成为主体性确立的重要标志。

此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时,以皇权、宗族为统治秩序,以儒家礼教来维持文化系统的治理方式,相较于“胡人”等游牧民族的文化具有显著优势。中华文化在吸收游牧民族文化长处的过程中继续繁荣发展。直至东汉末年和南北朝的动荡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被士族阶层和普通大众所接受,儒家思想一度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外来强势文化,应采取何种态度?这不仅关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影响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再次确立。这一难题在开放包容的唐朝以及理学昌盛的宋、明两朝得以解决。佛教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亮色。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第三个阶段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立国之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富民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路。这一百多年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将被西方列强几乎毁灭的文化尊严与文化信心逐渐恢复的过程,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重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

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个历史阶段,大体上分别直面和回答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个难题,即如何正确对待古今文化之辨、如何正确处理中外文化之争,以及怎样坚持自我文化立场。这三个难题背后的底层逻辑大体对应了三种需要高度重

视和警惕的错误思潮: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强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破除这三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前提。

(一) 祛除文化复古主义:正确对待古今文化之辨

文化复古主义是一种僵化、保守的文化观念,它体现在对待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态度上,表现为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是文化自负心态的集中反映。这种观念错误地将“传统”等同于“过去”,把历史文化视为凝固不变、完美无缺的样板,主张全盘继承甚至原样照搬古代的制度、思想、规范和生活方式。这种思潮源自对现实变革的焦虑,或是对民族文化衰落的担忧,试图通过回到过去来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出路。然而,它脱离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忽视了文化本身具有发展性和流动性,只强调对传统的“守”,却忽略了与时俱进的创造。这本质上是一种以静止对抗变迁、以过去否定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第一阶段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一味复古到周礼旧制,就不可能出现诸子百家文化繁盛的史诗级景象,也不可能催生制度上大踏步前进的秦汉王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正是对古今文化之辨的最好回应。

祛除文化复古主义的遮蔽,关键在于确立“文化自为”的立场,以自主、自觉、自为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这既要求我们在赓续传统的过程中锐意进取,又要在开拓创新的实践中实现发展,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张力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由此可见,秉持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清醒的批判意识,对那些僵化保守、脱离时代发展的文化复古主义观念及其具体表现展开深入剖析与有力批判,是文化主体性建构与发展的首要理论前提。

(二) 抵御文化强权主义:正确处理中外文化之争

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破除的第二个错误思潮是文化强权主义,它主要涉及在面对外来强势文化冲击时应持有的正确立场。文化强权是指

强势国家或强势文化体凭借其优势地位,大规模输出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对他国或弱势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和文化生态进行渗透与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试图将自身文化模式塑造为具有普遍性的标准,进而维护其利益和文化霸权。佛教东传虽非“文化强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但确实是外来“强势文化”冲击的典型案列。在此冲击下,传统文化如何站稳脚跟、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的纷争,需要大智慧。历史上,在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最终在佛儒和解中实现了相互改造、共生共赢,从而再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破解文化强权主义的侵蚀,维护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这不仅是提升文化实力的发展路径,更是对民族精神的确立与坚守。这种自强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是悠久的文化基因。它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熔铸了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民族品格与宝贵传统。“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3]341}

今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决抵御文化强权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坚定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以文化自强的战略定力和切实行动,自觉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与交流互鉴中,确保中华文化既能坚守根脉,又能枝繁叶茂,从容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

(三) 破解文化虚无主义:坚守文化自信自强立场

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否定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内在价值,并刻意贬低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贡献的错误思潮。这种观念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文化自卑心理,即面对外部强势文化冲击时产生的迷失感,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缺乏全面深刻理解所导致的信心匮乏。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在与西方列强碰撞中遭遇的挫折,部分群体中滋生蔓延着对自身文化的失望

情绪,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倾向,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视作可疑甚至全然否定。这种思潮通常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歪曲、否定中国历史,试图否定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二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是导致近代落后的根源,主张全盘抛弃,并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文化模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再造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表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4]708}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

抵制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核心在于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也是对中华文化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文化自信深深根植于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灿烂成就、独特智慧以及对人类文明重大贡献的深刻认知。文化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自觉与自强。它意味着我们要珍视并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华文化新辉煌。同时,我们也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斗争精神,对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论调进行深刻的辨析与坚决的批判。

我们可以从追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看到,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三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是建构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前提,也是守护民族文化生命之流与活力之源的思想防线。

二、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与文化冲击使中华文明遭遇空前危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怀疑致使中华文化主体性一度“失落”。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开启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探索与系

统重塑。

(一) 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民族危机中“失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面临断裂危机,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民族危机的加剧催生了追求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驱动着变革的开展。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各阶层相继探索了多种救亡图存的方案。地主阶级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试图通过“中体西用”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但甲午战败宣告了这一努力的破产。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戊戌变法,首次尝试将变革延伸至制度层面,在文化教育领域废除八股、兴办新式学堂,虽因守旧势力反扑而失败,但促进了思想启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然而未能根除封建思想文化,且资产阶级自身存在软弱性,使得革命成果有限。

民族危机的深化与文化危机的加剧形成历史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向。1915年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全面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张。这一批判虽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辩证分析与继承。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尚未找到先进、正确的思想引领,也未踏上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5]832}在传统价值崩塌与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陷入深层困境。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先进知识分子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逐步认识到文化重建必须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相结合。这一根本转变在五四运动中初现端倪,并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实现。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塑”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来凝聚革命力量。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以及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唯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革命方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自觉肩负起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文化意义上“自我”的核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建立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并在这种自觉意识的引导下,带领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文化更新与转型的实践。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国家”^{[4]663},即重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诞生了一支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崭新文化生力军,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发起进攻。同时,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和其他群众,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改造整个国民文化,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现。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实现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开启了文化主体性重塑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立精神,主动承担起重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使命,致力于打造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6]831}。通过建立新型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文字、发展民族艺术等举措,极大地激发了长期被压抑的文化创造潜能,文化领域呈现出新气象,有力地推动了面向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党带领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孕育出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宝贵的时代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动力。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367}这一论断提高了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59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改善的民生福祉,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和广阔空间。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多元化挑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举措凝聚了社会共识,振奋了民族精神,为现代化建设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思想保证,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巩固和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通过坚定文化自信,建立强大的文化自我意识,树立文化主体性”^[9]。通过战略擘画、政治保证、理论创新和价值引领四个维度的举措,党在新时代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

首先,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筑牢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10]文化事业关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把文化建设摆

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46}这种在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本身就是对文化价值的深刻确认，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有力彰显。

其次，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筑牢高扬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屏障。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正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我们党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掌握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权。”^{[11]13}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味着能够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服务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健康发展构筑起坚固的政治防线。

再次，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激活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10}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鲜活的中华文化生命力。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同时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增强了文化自信，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最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凝聚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13]190}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旨在整合社会思想、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尚，为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凝聚力。

三、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将文化主

体性认知转化为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生动力，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目的和关键所在。

（一）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物质基础与坚守其价值归依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4]525}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主体性也并非空中楼阁，它本质上是特定时代社会实践活动在精神层面的反映与自觉。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仅是巩固与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物质基础，更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归依和实践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全面推进的过程本身就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机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科技自立自强、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均转化为滋养文化发展的丰厚资源，成为增强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创造力的强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国力提升与民生改善，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土壤和物质滋养。

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真正价值也体现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文化主体性不能自我孤立、自我欣赏，而必须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的过程中彰显其现实意义。中华文化主体性只有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解决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才能真正“立得住、行得远”。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国家强盛与社会进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自信便难以获得坚实的现实依托；脱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将失去其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

（二）坚持把“两个结合”作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本途径在于坚持“两

个结合”。“两个结合”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指导思想的尊崇与坚持,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高度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两个结合”使我们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魂脉”,又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聚变为新的文化优势,这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所在,也使我们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独树一帜、站稳脚跟。

“两个结合”的深入实践,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的根本保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和必然要求。“两创”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宇宙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筑牢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坚持“两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绝非文化保守或复古,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激活传统文化,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和现代文明相契合,转化为具有活力的现代文化形态,为文化繁荣发展注入基于“两个结合”的强大动力。

“两个结合”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确保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两个结合”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可能导致文明断裂或全盘西化的路径,它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一条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因此,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推进“两创”,不断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有助于确立一个坚定的文化自我认同。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和来源,是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和互鉴中保持其鲜明特性与主体地位的根本前提。

(三) 凸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

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展现中华文化主体性蓬勃生命力与深远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中华文明演进维度审视,跨区域文明交往的陆

海丝绸之路既吸收了外来文化资源,增强了自身生命力与多元特质,也传播了中华文化,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这种双向互动充分证明,持续的文明对话是保持文化特性与提升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自人类文明步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更加密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8]35}

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并不断增强影响力。中华文明内蕴

“和而不同”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理念,这种主体性并非意味着排斥或故步自封,而是强调在开放接纳外部文化元素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与文化定力,进行批判性的选择、吸收与再创造。这种基于主体意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正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核心体现,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中“创新”,在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平等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仅构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蕴含中华文明基因的中国智慧。

四、结语

巩固文化主体性,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与未来。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理论前提和内在逻辑,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稳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再创中华文化新辉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 张志强, 杨洪源.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10): 4 – 14.

[10]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编: 程爱婕)